

下一次大战？

“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美]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史蒂文·米勒 主编

陈鑫、程旻 译



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

下一次大战？

“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美]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史蒂文·米勒 主编

陈鑫、程旻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下一次大战?: “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美)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美) 史蒂文·米勒主编; 陈鑫、程旸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 5

书名原文: 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 S. - China Conflict

ISBN 978-7-5166-2574-3

I. ①下… II. ①理…②史…③陈…④程… III. ①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046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6-0445

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 S. - China Conflict

By Richard N. Rosecrance, Steven E. Mill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IT Press, U. S. A

Copyright © 201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简体中文出版版权归新华出版社

下一次大战?: “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主 编: [美]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史蒂文·米勒 译 者: 陈 鑫、程 旸

责任编辑: 张 敬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彩丰文化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10.7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2574-3

定 价: 49.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序言：萨拉热窝事件百年——1914 与中国的崛起//1

史蒂文·E·米勒 (Steven E. Miller)

大国平衡、结盟关系和外交

1 战争之前：三种类型的外交//25

艾伦·亚历山德罗夫 (Alan Alexandroff)

2 权宜之计还是万全之策：不断出现的危机与战争的起源//38

阿瑟·A·施泰因 (Arthur A. Stein)

3 与其等待，不如现在：悖论 1914——所有人都认为最适合开战的一年//55

杰克·斯奈德 (Jack Snyder)

4 盟友、失衡与战争//86

理查德·N·罗斯克兰斯 (Richard N. Rosecrance)

5 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104

理查德·N·库珀 (Richard N. Cooper)

激辩修昔底德陷阱

6 修昔底德陷阱//127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 7 推翻修昔底德：历史差别弱化伯罗奔尼撒类比//138

戴维·K·理查兹 (David K. Richards)

- 8 修昔底德、结盟政治和大国冲突//151

查尔斯·S·梅尔 (Charles S. Maier)

内幕：国内因素与战争根源，彼时与现在

- 9 战争、革命和国内政治变化无常的重要性//167

T·G·奥特 (T. G. Otte)

- 10 国内联盟、国际化和战争：彼时与现在//201

埃泰尔·索林根 (Etel Solingen)

- 11 欧洲军队与一战起源//234

斯蒂芬·范埃弗拉 (Stephen Van Evera)

萨拉热窝事件百年：审视过去，面向未来

- 12 必然性与战争//277

小约瑟夫·S·奈 (Joseph S. Nye Jr.)

- 13 1914 年的欧洲给 2014 年的亚洲带来的启示：对一战爆发百年纪念的思考//299

陆克文 (Keven Rudd)

- 14 权变因素（或小事情有大影响）//322

理查德·N·罗斯克兰斯 (Richard N. Rosecrance)

作者简介//332

序 言

萨拉热窝事件百年——1914 与中国的崛起

史蒂文·E·米勒 (Steven E. Miller)

1914 年的金色夏日，奥匈帝国王储在远离维也纳、位于巴尔干半岛的波黑省遇刺身亡，它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在几周内使欧洲诸大国陷入战争。接下来发生的是无可比拟的巨大灾难。战争代价高昂；在 4 年多的残酷岁月里，参战的各大国挥霍了大量的生命和财富。数百万人战死沙场，多个国库被掏空。战争的影响巨大而持久。在战争结束时，四大帝国——德意志、沙俄、奥地利和奥斯曼——被摧毁。欧洲和中东版图重新划分。德国和俄国被内部的革命吞噬，注定对两国以及全世界产生长期影响。即使是欧洲的胜利者法国和英国，也被战争的巨大消耗削弱，加速了它们大国地位的衰落。在一战的废墟中，出现了对 20 世纪余下岁月至关重要的新事物：纳粹主义的崛起、第二次全球性战争，以及让苏联与美国成为死对头的冷战——苏联诞生于俄国的 1917 年革命，而美国则从一战中毫发无伤地崛起。1914 年夏天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旧的世界将被摧毁，而新的道路既黑暗又危险。这是现代历史中最具决定性

下一次大战？

的转折点之一。

从这一点来说，1914年的一系列事件在百年后仍然十分引人关注丝毫不令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战争起因的争议始终没有平息。即使是一些基本的事实也依然颇具争议。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辩论也从未停止。随着新证据的发现以及国际政治新理论的提出，对于一战也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重新解读。国际关系学术领域在最近几十年取得了巨大进步，出现了许多有关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相互依赖、预防性战争、进攻—防御理论、示意与博弈、理解与误解、遏制以及遏制失败等新概念的论文，学者们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对1914年进行了重新解构。然而，当我们回顾历史，试图去理解1914年的政治精英是如何给他们的国家带来这前所未有的灾难时，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始终没有变化：这场灾难是怎么发生的？怎样解释1914年的一系列事件？有大量的文献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戏剧性的1914年让我们关注过去，但如果我们着眼未来，还会发现一个让人同样困扰的问题：1914年的事件是否会再次发生？让各国在1914年不可阻挡地走向战争的那些力量和因素是否还会在我们的时代发挥作用？是否有迹象表明1914年的要素可能在现代重现？

本书的目的是回顾过去，面向未来。撰稿人被要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寻找警示性迹象、教训、令人警醒的故事，或者（可能）能够应用于现有国际秩序的因果结论等。我们从1914年的

案例里能够学到些什么，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且——更重要的是——塑造今天的国际政治？我们能否发现那些应当避免的悲剧性错误？我们能否通过理解过去导致大国冲突的原因来降低未来出现大国冲突的可能性？由于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是 1914 年大国间的暴力冲突，在当今世界，这些问题直接引向了中美关系。如果未来会发生大国冲突，似乎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挑战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1914 年的事件会否在这两个大国之间重演？竞争似乎无法避免，但这种竞争是否能够得到控制，从而避免发生战争？中美关系中是否存在一些因素，会像 1914 年那样引发局势升级直至战争？我们的撰稿人试图通过他们对 1914 年的理解来评估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分析现在与 1914 年的异同，强调可能的威胁和潜在的机遇。

回顾过去：什么造成了 1914 年的灾难？

对于 1914 年战争的深层原因以及直接原因的历史学分析并没有得出唯一或者简单的解释。接下来的章节反映出，历史学文献对 1914 年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特点。这些章节将从不同层面进行解释，有些关注 1914 年的某个特殊维度，有些则在分析中运用了多种决定性因素。

有害的思想

在许多章节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在某些章节中这一主题

甚至是题目本身，那就是1914年前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简单地说，1914年的许多重要决策者（以及他们身边的精英和他们所管辖的民众）都受到一些有害思想的影响。例如，现在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但在当时，战争是光荣的。战争被广泛视为一种高尚、纯粹和受人欢迎的事情，是对人和制度健康程度的检验，是文明的助推器和进步的源泉。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在他撰写的章节中指出，战争的爆发在许多角落引发了人们的“狂喜”。陆克文提醒我们，在世界各大城市，人们欢欣鼓舞地庆祝开战。然而，在经历了1914年至1918年的屠戮之后，这种思想就荡然无存了。

战争不仅是受欢迎的，在许多人看来，它还是不可避免的，对欧洲军队来说尤其如此。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他撰写的章节中警告说，在国际政治中设想战争必然会发生是极其有害的。在他看来，这种设想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一旦假设战争必然发生，那么领导人和军方的演算就会发生变化。问题就不再是是否会或者是否应该发生战争，而是何时发动战争才对己方最有利。即使是那些并不热衷于战争或者对战争毫不乐观的人，当他们处于战争不可避免的架构之中时，也会选择开战。杰克·斯奈德（Jack Sneider）指出，1914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所有的欧陆大国都认为当时是开战良机；欧洲的很多重要人物相继作出判断，现在开战比以后开战要好。在均势变化之际，决策者之间很明显可以看到预防性战争的逻辑。

范埃弗拉、斯奈德、奈等学者重点指出，欧洲各国军队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进攻崇拜”，他们深深（但错误）地相信进攻是战斗的高级形式，而先发制人的进攻有着巨大优势，甚至可能决定战争成败。到1914年，所有的欧陆大国都采取了进攻性军事理论，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并最终导致战争爆发。在一个以进攻为主导的世界，征服总是被想得很简单，等待外交斡旋则会很危险，犹豫就意味着失败，而总动员就意味着战争。尽管一些悲观但有远见的人担心可能会出现持久战，但对进攻决定论的笃信导致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观点，那就是战争会很快结束，某一方会完成致命一击。既然战争既短暂又光荣，还必胜，那为什么要避免战争呢？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在他的章节中指出，如果1914年的各国领导人对于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代价有更为准确的认识，他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地避免战争。但他们的战争设想导致他们产生了与事实截然相反的期待。

与这些军事倾向相匹配的是一套促使各国采取进攻性外交政策的信念体系，这一点在德国尤其明显。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个国家都会受到考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并且在权力等级中晋升。“不扩张就死”的哲学带来了更多领土或殖民地的贪婪，帝国则被视为力量的源泉和象征。“在威吓中取胜”的策略折射出对国际政治胁迫模式的深信不疑；立场坚定、毫不动摇、表现强硬、避免妥协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特质，而妥协则预示着软弱和投降。1914年的许多精英相信自己参与的是

一场生死攸关的竞争，这场竞争将会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国家未来发展的轨迹是上行还是下行，以及他们国家的相对实力是得到增强还是削弱。在这场竞争中，最重要的是维护和捍卫本国在权力等级中的地位，并且集结和使用能够决定它们世界地位的力量。对德国和俄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来说，这意味着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谋求或者攫取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对那些担忧自身地位会相对下降的国家来说——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这意味着尽一切可能保护自己的国际地位免受新晋挑战者的威胁。

欧洲领导人在回顾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历次战争时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防御姿态是有利的，经过精心准备的防御能够挫败进攻力量并且造成重大伤亡，因而防御姿态可以有效保护本国领土。范埃弗拉在他的章节中指出，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结论。此外，欧洲各国领导人对于未来有着不同的期许，他们可能会寻求维护和平，而不是为他们心中不可避免战争作准备。类似的，他们可能会避免对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出零和博弈式的解读，而是像早前一段时期那样——正如艾伦·亚历山德罗夫（Alan Alexandroff）指出的那样——欧洲各大国曾在一个协调体系内相互合作，使它们能够长期有效地解决纠纷。在俾斯麦时代，保持克制有时比发动侵略更受人尊重。如果以上这些情况真能发生，萨拉热窝危机就本可以用一种和平的方式解决，总动员也将显得毫无必要，而1914年的灾难也可以避免。

然而，范埃弗拉所说的“好战”思维——包括战争光荣、战争

不可避免、战争很短暂、进攻性战争、战争必胜等，都促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外交政策——影响了许多欧洲重要领导人的选择和期待。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萨拉热窝的一个火星就点燃了整个欧洲的大火。

国内政治失能

对1914年一系列事件的第二层解释主要着眼于欧洲大国的国内政治。本书后文的分析提出了几个主要观点：

首先，在几个关键国家——主要是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主导国内政治的国内联盟接受了当时十分盛行的好战派观点。埃特尔·索林根（Etel Solingen）在她撰写的章节中指出，在国内政治环境中，总是有着多种力量和思想在争夺权力和影响。她认为，外向型国内联盟重视经济增长，始终寻求在开放的贸易体系里促进出口；它们反对战争，因为扩大与世界经济的互动能够让它们获益。相似的是，和平团体和国际法律与仲裁的倡议者也不断质疑好战派的思想与偏好。然而，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政策掌握在一些内向型、军事化且崇尚好战思维的人手里。这些思想影响巨大，在两个大国同盟之间的政治竞争中占据了上风。

两大因素强化了好战派联盟在国内取得胜利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存在危险的民族主义情绪——索林根称之为“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情绪能够发动民众，煽动民族主义狂热，激起对其他国家的仇恨，并且促进对激进政策的支持。另一个因素是军国主义

下一次大战？

思想的流行，标志是对军队的崇拜和顺从。这一因素确保军队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巨大且不相称的影响力。军队一方面大肆鼓吹和传播容易导致战争的观念，一方面又拥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和强大的能力来宣传自己的观点，既向政治精英宣传，也向普通大众宣传。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就像是密不可分的双胞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拔高了军队的地位，也吸收了军队的观念。

其次，欧洲当时面临一场危机，T·G·奥特将其称为一场欧洲范围的治理危机。每个国家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整个欧洲都深陷困境。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当时正试图压制或者适应大众政治的崛起以及君主制合法性的消亡，却缺乏足够的技巧，也没有获得多少成功。奥特指出，德国处于一种“持久性国家危机”之中，政府混乱而无决断，财政状况也是一团乱麻。奥匈帝国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国家，它由不同的地区、民族、语言和宗教构成，内部分歧严重，还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结构性问题，使其无法实现国家团结。俄国被其政府高层以及沙皇宫廷内部的权谋斗争撕裂；到1914年，俄国已经陷入“持续性混乱”。与此同时，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被政党分歧、政客间的敌意以及宪政危机撕裂——这些国家的政府“风雨飘摇”、“四面楚歌”，僵局已经成了常态。正是这些因国内政治环境失能而受到掣肘——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受到削弱——的人和政府作出了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一些决定。

这种普遍的国内危机并没有促使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寻求用战争来转移国内注意力；相反，奥特指出，欧洲大国国内政治的脆弱

是一个制约战争爆发的因素。各国政府不稳定、不自信、毫无决断也软弱无力，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一直到事情已经不可挽回才有所反应。它们无法制定一以贯之的战略，也无法协调各项政策。战争车轮的前进无法遏止，温和派力量却一再遭到削弱。自信、有效且战略合理的政府治理也许可以阻挠战争的脚步，但它完全不存在。身陷国内危机之中的软弱政府，在深受好战派思想荼毒的执政联盟的带领下，作出了最终在 1914 年导致战争的决定。奥特得出的结论是，1914 年的开战决定反映出一些国家的政治瘫痪和另外一些国家的治理危机。

后文提出的最后一个国内因素主要关注身处权力顶峰的那些人的个人素质。欧洲的不幸在于，在极端危险的时刻，它的统治者都是些资质平平又性格怪异的人物。在 1914 年作出开战决定的那三个帝国的皇帝尤其无能。奈对他们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德皇是一个“软弱、冲动又爱放嘴炮的家伙”，缺乏治国才能；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是一个疲倦的老人，任由好战派摆布”；而沙皇则是一个“孤立的独裁者”，身边都是一些平庸无为的政府部长。然而，欧洲领导人的无能不仅限于这些皇帝们。奥特指出，德国总理特奥巴德·贝特曼·霍尔韦格是一名有缺陷的技术官僚。法国领导人勒内·维维亚尼既是总理又是外交部部长，却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在卷入这场危机中的人里，没有一个能称得上伟大或者拥有哪怕一丁点儿俾斯麦式的智慧或者基辛格式的才能；在危机紧要关头，没有一个政治家挺身而出拯救欧洲免于自我

下一次大战？

毁灭。

戴维·理查兹（David Richards）指出，处在危机中心的三个皇帝体现了世袭君主制的衰落。他们“落后”的政府形式给指定的继承人赋予了巨大的权力，却不顾他们的资质或才能。他们的政权越来越不受欢迎，越来越不具备合法性，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也无法适应强大的社会经济力量。这三个古怪而愚蠢的男人影响力日渐衰微，却给整个欧洲点燃了战争之火。理查兹指出，强大的君主可能会对怂恿进行总动员的将军们说不，但 1914 年并没有这样的君主。

有害的思想带来错误的决定，最终导致 1914 年的战争。这些有害思想在不同的国内政治环境中产生，影响了关键国家主流执政联盟的世界观。各国政府作出了错误决定，无论决策机制有多不完美，它们在作出决定的每一步都曾有过其他选择，也有能力作出选择。因此，各国内部的政治和决策过程是 1914 年悲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内容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战争的国际舞台

第三个层面的解释主要着眼于国际秩序中有哪些因素、力量和态势造成了战争爆发。1914 年的国际形势有许多特性共同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但在本书的讨论中，有两大特性尤其突出：

第一，欧洲体系的均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造成新兴国家和衰落国家之间的关系既紧张又混乱。1914 年，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

岛所取得的成功让奥地利十分警惕；俄国从 1905 年的战败和革命中恢复，其力量的增长让德国和奥地利警醒；德国力量的增长又让法国和英国十分警惕；杰克·斯奈德指出，均势的不利变化让各国产生恐惧，从而促使欧陆各国作出判断，认为立刻开战比晚些时候开战要更好。修昔底德在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就指出了这种因果关系的动因：正是雅典实力的崛起及其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引发了战争——这现象如今被称作“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戴维·理查兹、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和小约瑟夫·奈在本书中均对这一现象有所分析。1914 年见证了修昔底德陷阱再次发挥作用：均势的变化所引发的恐惧反应最终导致冲突。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意味着战争是必然的，但它的确会造成摩擦并且催生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动力——而在 1914 年，这些的确促成了战争的爆发。

第二，欧洲的秩序是围绕着两个针锋相对的大国联盟而构建的，这让各国的命运彼此交织在一起，增加了局部冲突引爆欧洲大战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在 1914 年成为现实。如果说本书有一个明确主题的话，那就是结盟态势代表了一种巨大的危险，可能导致各方都不愿看到的冲突。艾利森、奈、罗斯克兰斯、库珀、陆克文和梅尔均警告说，各国应提防结盟关系的恶果。在 1914 年的危机中，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德国支持奥地利，法国对俄国有保护义务，这些因素使萨拉热窝发生的刺杀案演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盟友之间必须相互救援。”梅尔则强调结盟态势给各国领导人带来的“痛苦选择”：要么抛弃盟友，从而削弱自己的地位和信誉，要么支持盟友，但要冒着开战的风险。为了留住盟友并向它们提供可靠的承诺，各国甘冒这样的风险，但因此造成的复杂情况有可能给它们带来巨大影响甚至是灾难。

国际秩序的这两个特点为世界性大战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均势的变化产生了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动力，结盟体系使战争一旦爆发就有可能吞噬欧洲的所有大国。但国际格局的其他几个特点也对最终导致战争的国际环境产生了影响。1914年的两个大国同盟相对来说实力较为均衡。这种力量上的平衡使双方都认为自己可能取得胜利，并且都判断战争的结果值得它们为之冒险。如果有一方拥有数量上的明显优势——罗斯克兰斯称之为“失衡”——双方可能更容易避免战争，因为弱小的一方几乎没有动力去参加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

军备竞赛加剧了大国对于均势变化的担忧。有几个欧洲大国当时正处在军力建设过程中，这在其他国家引起焦虑，这种焦虑带来动力，成为后者想要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另一个原因。为何不在敌人的军事现代化完成之前就发动战争呢？对战争的预期又因技术的快速变革而进一步恶化。铁路里程的增加、军队的机械化改造以及枪械的进步均改变了战争的逻辑和杀伤力。到1914年，欧洲的领导人 and 军队很显然还没有完全理解技术变革所产生的影响，但他们已